

■ 教育学理论

我国古代家庭教育优良传统和方法探析^{*}

——从家训看我国古代家庭教育传统和方法

余 双 好

(武汉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余双好(1964-),男,湖北天门人,武汉大学法学院思想品德课部副教授,主要从事德育研究。

[摘 要] 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具有独特的内容和方法,具体表现为家训形式“种类繁多”、“多元推进”、“理论系统”、“文献丰富”等特点;家庭教育内容“家国一体”、“德教为先”、“崇尚人格”、“尚学”、“早教”的优良传统和“慈严相济”、“以身示范”、“因材施教”、“循序渐进”、“注重环境”的教育方法。这些优良传统和方法,对我们当今教育子女,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 家庭教育;优良传统;方法

[中图分类号] G 7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999(2001)01-0116-07

我们中华民族历来以重视家庭教育著称,家庭教育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数千年的历史中,积累了丰富的家庭教育经验和浩如烟海的家庭教育文献,这些家庭教育的经验和文献经过漫长历史演化,早已从一家一族的训示,繁衍成为全社会乃至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而其中渗透着的一些有关家庭教育的内容与方法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学术界对我国古代家庭教育中的基本观念(如“孝”、“仁”、“礼”等)和家庭内部伦理关系及道德教育的当代价值做过许多较全面深刻的论述,但从方法论的角度系统整理古代家庭教育本身价值和功能的论著不多^①。本文拟重点从古代家庭典籍和文献的整理中透视家庭教育本身内在的价值。

—

家训是我国家庭教育所特有的一种文献形式,是我国古代历代家长为了教育子女而专门撰写的训诫、家规、家书等,这些家训往往浓缩作者丰富的人生体验,饱含深厚的爱子之情,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教育意义。

家训这种形式在我国历史悠久,其著述形式和文体样式,有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形成著名的“畴人之学”,即家庭世代相传的学问。西周时期“帝王之学”鼎盛,周公辅佐并教导成王就是一例。这时的家训主要以口头训诫、遗书、家书等形式为主,由后人记载而流传。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家庭教育理论的成熟和具有独立形态的家庭教育文献形式的

* 收稿日期: 2000-03-01

出现,在家庭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经过短暂的沉寂,到宋代达到繁荣,宋代家庭教育不仅文献和资料数量多,而且在家庭教育理论和思想上也有新的发展。如司马光的《家范》及其他一些家庭教育著作,对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理论和思想做了系统总结,并提出了更完备的以封建伦理道德为中心的家庭教育体系;袁采的《袁氏世范》及其他一些著作继承了颜之推家庭教育思想成果,形成独具特色的袁氏家训,《四库全书总目》称《袁氏世范》为“颜氏家训之亚”;陆游的《放翁家训》,利用诗歌形式进行家庭教育,把唐代的教子诗推向新的境界,他的教子爱国报国和劝子学习的诗篇更是脍炙人口的教子诗文精品;此外,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官宦家庭教育理论,以叶梦得为代表的中层官僚的治生思想,以欧阳修、三苏为代表的文学家群体的家庭教育诗文,以朱熹、二程为代表的理学家群体的家庭教育理论,以钱乙为代表的科学家群体的科技家教,以《郑氏规范》为代表的中下层地主家庭的家庭教育实践等等,都对后世产生了广泛影响。明清时期是我国家庭教育广泛推广的时期。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倡导,家庭教育在广大老百姓中广泛传播,形成家庭教育的空前繁荣局面。

综观我国家庭文献发展历史,我国传统家庭教育具有以下显著特点:

一是种类繁多,包括有帝王家教、高层官僚地主家教、中下层地主家教、士大夫和名儒的家教、科学家和文学家的家教等。各阶层家教虽然以儒家伦理为主导思想,但其侧重点不同,因而表现出家教的内容也各具特色。

二是多元推进。我国家庭教育在发展中,表现为多元推进的演绎过程。(1)从宏观上有一个从萌芽到初步形成、逐步成熟,再到广泛推广的过程;(2)从家庭教育内容上看,也有一个从帝王家庭教育、官僚贵族家庭教育、士大夫阶层家庭教育,再到中下层官僚、地主家庭教育,最后广泛推广到老百姓家庭教育的过程;(3)从家庭教育文献形式来看,有一个从经书,到家训、家范、家书,再到格言、家规的过程,逐渐走向大众化和平民化。

三是理论系统。在我国,家庭教育理论虽奠基于先秦诸子,但作为家庭教育理论的完善形态,当首推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颜之推系统总结了前人家庭教育理论成果,提出了教子论、学习论、修身论和治家论,提出了家庭教育的一些理论和范畴,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家庭教育理论。宋代司马光继承和发展了颜之推家庭教育思想,从“治家”、“祖”、“父”、“子上”、“子下”、“女、孙、伯叔父、侄”、“兄弟、姑姊妹、夫”、“妻上”、“妻下”、“舅甥、舅姑、妇、妾、乳母”等分篇情况,可知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封建伦理关系、治家方法、子弟身心修养和为人处世的道理,堪为家书中集大成者。而明清之际朱用纯的《治家格言》,仅 506 个字,但内涵十分丰富,概括了治家、理财、读书、做人、处世等基本准则和基本要求,其语言多采取格言警句形式,琅琅上口,因而广为流传,是家庭教育广泛推广时期的家庭教育理论的典范。这三部家庭教育文献分别代表三个不同时期家庭教育理论的最高成就。

四是文献丰富。自从颜之推创立家训这种家庭文献教育形式以来,家训就成为家庭教育的基本文献形式,“古今家训,以此为祖”,是对《颜氏家训》最好的评价。我国历史上家训十分丰富,《中国丛书综录》所录的家训有 119 种;《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珍本初集》中收录家训 171 篇,是南宋以前的家训总汇大观;清代修订的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中《家范典》达 116 卷,共分 31 部,各又再分 5 类,辑录了先秦至清初的大量家训资料。我国许多成功官吏、学者、商人乃至平民百姓家中,都藏有一部传世家训,后世子孙常常温习,作为自己人生道路指南。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的这种特殊的文献形式,是我们祖先对家庭教育深入思考的智慧结晶,因此流传至今,经久不衰。

二

通过分析总结各类《家训》,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古代在长期家庭教育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许多优良传统,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家国一体的优良传统 我国古代之所以提出家国一体的观念,是同儒家关于个人、家庭、国家三者

关系的理论分不开的。孔子提出“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思想,这一思想明确了修身、提高自身素质、逐步安人(包括朋友、九族)、安定社会的思想。孟子从家庭内部关系出发,提出:“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1](《尽心章句》下)。说明当家长的首先必须以身作则,才能有教子女的威信,进而引申出自身、家庭与国家天下的关系问题:“人恒有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1](《离娄章句》下)《大学》对这一思想作了经典式的概括,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身修而后齐家,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2](《大学》)的家国一体的教育理论,明确阐明了家庭教育与国家、社会的关系,说明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对我国形成重视家庭教育和把家国作为一体的优良传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家国一体的观念到了宋代以后表现得更为集中,宋代大学者司马光总结了历代家庭教育的经验和教训,强调齐家为治国之本,家庭教育搞不好,就无法教好别人:“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民法之也。此所谓治国在齐其家。”^[3](卷一)即你的言行只有打动自己的家人,使家人效仿,才谈得上影响其他人。再进一步提出治国与治家相通之处,如家长能慈,到社会上便能以慈待人;子弟能孝,到朝廷中便移孝为忠。只要人人能尽忠孝,也就能“定天下了”。这就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古代家庭教育中家国一体的传统。

2. 德教为先的优良传统 中国古代社会是以伦理为本的社会,而人的道德素质首先在家庭中形成,只有在家庭中受到正确的教育,养成良好的素质,才能成为社会的好成员。孔子是德教的大力倡导者,在《孝经》中,孔子提出“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因和睦,上下无怨。”“至德要道”是什么呢?孔子提出:“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4](《孝经》)在《论语》中,孔子更是把“孝悌”当成“仁”之根本。“其为入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也;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5](《学而》第一),充分体现了德教为先的思想。

首先,体现在古代帝王的家训上。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实现长治久安,十分注重对自己子女尤其是太子的培养。如西周时期,周初最高统治者总结前代覆灭的教训,就提出“敬德保民”的家庭教育思想。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学家们,更把德教看做是治国的首要任务,提出“德教为先”的思想,认为治理国家要靠德教和刑法两手,两者相较德教优于刑法,以此提出了“先德后刑”的思想,强调“以德服人”。因而,在帝王家庭教育中,统治阶级无不把为人君的道德教育作为帝王家庭教育的重点。

其次,表现在士大夫阶层和贵族的家训家范上。如从西周起,贵族家庭就有一系列德育内容纳入家庭教育:孝敬父母、尊敬师长、礼让、诚实等。孔子以仁和礼为基础的家庭教育,孟子主张家庭教育中理想人格的教育。到南北朝颜之推《颜氏家训》中提出知足守廉的观点,宋代司马光在《家范》中开篇就提出“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所以他提出“治家莫如礼”,通过礼的规范,达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3](卷一),即达到封建社会所需要的伦理道德。

其三,表现在下层老百姓家训、家规、族规上。如我国流传甚广的《增广贤文》中,就含有大量抑恶扬善、勤俭治家、积德助人、与人为善、见利思义等思想和内容;朱用纯《治家格言》把老百姓治家的格言,如起居有常、勤俭持家、生活朴实、教子有方、勿贪便宜、忠厚治家、孝敬父母、嫁娶不慕富贵等,用家训、家规的形式加以巩固,以教育后代;而各家族形成的族规则更强调伦理规范的作用,把它作为治理全族人共同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这也是明清时期注重家庭的社会功能,利用家庭进行伦理道德教育和统治的结果。

3. 注重人格培养的优良传统 我国古代家庭教育中非常重视良好品格的培养。孟子十分注重家庭教育理想人格的塑造,提出了他推崇的理想人格:“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1](《滕文公章句》下)诸葛亮的《诫子训》提出,“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从此,追求理想人格就成为中国士大夫阶层共同的人生追求,也是家庭家风教育和对子女品德教育的重要内容。

注重人格培养的传统,集中表现在家风建设特别是为官清廉的清白家风上。我国古代为官清正廉

洁,注重培养子孙清白家风的例子数不胜数,如汉代杨震为官清廉,有一次途经昌邑,县令王密为报答他的知遇之恩,夜里特地带了十斤黄金去送给杨震,杨震见了,很生气地责问:“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杨震因不受私谒,生活清苦,子孙常吃蔬菜,出门则步行。当时有一些故旧长者常劝杨震为子孙置办产业,杨震回答说:“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6]《杨震传》)魏晋南北朝时期徐勉进一步从遗子以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关系,阐述了清白传家的思想,据《梁书·徐勉》记载,徐勉“虽居显位,不营产业,家无蓄积,俸禄分贍亲族之穷乏者。门人故旧或从客致言,勉乃答曰:‘人遗子孙以财,我遗之以清白。子孙才也,则自致辘辘;如其不才,终为他有’”^[7]《徐勉传》)。他认为,家长的榜样作用看似无形,但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对子孙起着深刻影响,而物质财富毕竟是有限的,并且这种财富还不一定永远为子孙所拥有。这就是后人所谓“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的由来。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当代,辛亥革命元老李烈钧将军在世时,曾有这样家训:子孙不如我,要钱做什么,子孙强于我,要钱做什么!

4. 劝学勉学的优良传统 中国古代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古代关于教子劝学勉学的格言、传说故事、家书家训更是不可胜数,仅从我国古代流传甚广、影响颇大的《三字经》来看,其中就列举了20多个劝学、勤学、励学的故事,来勉励孩子学习,如“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彼既老,犹悔迟,尔小生,宜早思。”这些故事,通过《三字经》琅琅上口的传颂,使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宋代汪洙曾专门作《神童诗》62首,劝勉孩子从小立志,苦读自强,将来光宗耀祖,做一番大事业,其中14篇劝学诗真是绘形绘色,具有很强的鼓动性,如:“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乃身上宝,儒为席上珍。君看为宰相,必用读书人”^[8](第3-21页)。这些诗语,其中虽渗透着封建地主阶级的人生观,不可取,但它们确实把读书的好处阐发得淋漓尽致,表明作者劝学的良苦用心。

我国古代家庭教育中劝学勉学的传统广泛体现在家训和家规中,如在《颜氏家训》中,就有专门一节勉学:“夫明六经之指,涉百家之书,纵不能增益德行,敦厉风俗,犹为一艺,得以自资。”“传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世人不问愚智,皆欲识人之多,见事之广,而不肯读书,是犹求饱而懒营饌,欲暖而惰裁衣也。读书之人自羲农以来,宇宙之下,凡识几人,凡见几事,生民之成败好恶,固不足论,天地所不能藏,鬼神不能隐也。”^[9]《勉学》第八)颜之推历仕四朝,始终靠自己的才学立足于乱世,他亲眼目睹了梁代士大夫子弟因不学无术造成可悲的局面,因此,深感学习的重要性,提出“积财千金,不如薄技在身”的思想和勤、精、博、虚、实的学习方法。正是由于家庭、社会广泛重视学习,形成了中华民族知书达礼的优良传统和学风。

5. 注重早期教育的优良传统 我国古代十分注重早期教育,且形成优良传统,这可以从我国古代十分重视胎教,并形成成熟的胎教理论与方法得到证明。我国早期胎教理论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统治阶层为了“使太子正而天下定”,当太子在胎中时就开始进行教育,认为:“故妊子之时,必慎所感,感于善则善,感于恶则恶。人生而肖万物者,皆其母感于物,故形肖之。”“太任之性,端一诚庄,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10](卷一)而汉代贾谊更把胎教的时间推前到选择婚娶对象,他认为婚嫁要选择有道德的人:“必择孝悌,世世有行义者。如是则子孙慈孝,不敢淫暴,党无不善,三族辅之。”^[11]《胎教》)在《颜氏家训》中,颜之推也充分论述了胎教方法,他说:“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怀子三月,出居别宫,目不斜视,耳不妄听,音色滋味,以礼节之。”^[9]《教子》第二)我国古代胎教理论后与医学结合起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胎教理论。

我国古代家庭教育中注重早期教育优良传统还体现在家训、家规、家书上。如《颜氏家训》中,颜之推结合自己成长历程,告诫子孙:“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以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并深有感触地说:“吾七岁时,诵《灵光殿赋》,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犹不遗忘;二十之外所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至荒芜矣。”并说,“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游,犹贤乎瞑目而无见者也”^[9]《勉学》第八)。宋代程颢、程颐也非常重视早期教育,他们说:“勿谓小儿无记性,所历事皆能不忘。故善养子者,当

其婴孩,鞠之使得所养,全其和气,乃至长而性美。”^[12](卷二下)清代张英在《聪训斋语》中更是告诫儿子,20岁以前所读之书与20岁以后所读之书迥异:“幼年知识未开,天真纯固,所读者,虽久不温习,偶尔提起,尚可数行成诵。若壮年所读,经月则忘,必不能持久。”^[13](卷下)中华民族之所以以聪明、智慧著称于世,我国古代所以神童辈出,与我们祖先重视早期教育的家庭教育传统有着直接的联系。

三

中国古代在长期家庭教育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理论,同时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教育方法。

1. 突出慈严相济的教育方法。宽与严是家庭教育中的一对矛盾,由于父母与子女的血缘关系,父母在子女教育方面比学校和社会教育更为有效和直接,同时也正是这种关系,往往使父母爱子过度,造成放任和溺爱,结果反而害了孩子,这就是家庭教育中爱与教的矛盾,也是家庭教育中的难点。在处理爱与教的矛盾方面,我国古代家庭教育中形成了慈严相济的教育方法。

中国家庭教育慈严相济的传统,主要源于儒家,孔子曾提出“为人父,止于慈”的观点。《孝经》有“严父莫大于配天”之语。可见,儒家既讲“慈”,亦讲“严”,讲究“慈严相济”。颜之推明确把“慈”与“严”结合起来,提出:“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还说:“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矣。”^[9](《教子》第二)司马光更进一步地发展了这方面思想,在爱与教的矛盾上,提倡慈训并重,爱教结合。他说“慈而不训,失尊之义;训而不慈,害亲之理。慈训曲全,尊亲斯备。”^[3](卷三)即父母只讲慈爱而不严加训教,便失去作为尊长的大义;只严加训教而不慈善,则伤害了骨肉相亲相爱之理,只有慈严结合,才具备了大义和亲情,是完整的家教。清代学者在处理家庭教育中宽与严的关系上,更强调“教子宜严”,但“严”不是动辄打骂,而是严格要求,“严”不仅包括对子女的严,也包括对家长的严,为父要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这就更全面地阐述了慈严相济的教育思想。因此,慈严相济的教育方法在我国家庭教育中成为优良传统。

2. 重视以身示范的教育方法。由于家庭成员长期生活在一起,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有着特殊的作用。正如颜之推所说,“夫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9](《序致》第一)也就是说,同样的一句话,人们总是相信亲近的人;同样一个命令,人们总听从所敬佩的人,家长的一言一行,对子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中,修身是基础,因此,儒家十分重视个人人格的培养塑造,并通过个人人格来影响他人。孔子就主张正人先正己,“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5](《子路》第十三)孟子继续发展这种思想,他说“吾未闻枉己而能正人者也。”^[1](《万章章句》上)在家庭教育中,他更是提出了易子而教的主张:“公孙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势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继之以怒,继之以怒则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也,则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则恶矣。’”^[11](《离娄章句》上)。即君子之所以不教子,是因势所不行,教者必以正道,如果儿子不肯听从,为父的必然发怒,伤害儿子的感情;儿子感情受到伤害,又会责怪父亲:“你要我走正道,你自己却不如此”,这样儿子又伤害父亲的感情,造成父子相伤,感情恶化,这就从反面说明了父亲的言行对儿女教育的重要性。颜之推在家庭教育中广泛地使用了身教示范的方法,他说:“人在年少,神情未定,所与款狎,熏渍陶染,言笑举动,无心于学,潜移默化,自然似之。”^[9](《慕贤》第七)也就是子女在家庭中接受教育,大都是在活动中无意识地接受的,家长的言行对孩子起着“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因而,我国古代很多人写的家训、家书中,比较普遍地采用了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亲身感受来教育子女的教育方式。由于我国古代家书家训都是家庭中德高望重的长辈写子女的教育材料,因此,很多观点都从自己切身体会说开去,这样无形之中对子孙起到了一种榜样的示范作用。

3. 崇尚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因材施教就是根据孩子性格和能力发展不同特点实施教育。孔子十分注意因材施教,据《论语·先进》记载,孔子的学生冉求做事胆小畏缩,而仲由胆大冒进、好胜,针对他

们两人不同性格特点,孔子采取不同教育方法,对冉求,孔子鼓励他要敢于前进;对仲由,孔子教育他要先退一步,不要冒失行事。这两个学生向孔子请教同样的问题,孔子作不同的回答,有弟子不明白为什么,孔子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5](《先进》第十一)因材施教的方法在家庭教育中也备受推崇,宋代袁采提出“性不可以强合”的思想,他认为世间最亲密的关系莫过于父子兄弟了,但为什么还会造成家庭不合呢?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重视对方个性,“其性不可得而合,则其言行亦不可得而合,此父子兄弟不合之根源也。”既然父子兄弟个性各不相同,不可强求,就应求同存异,因材施教:“为父兄者通情于子弟,而不责子弟之同于己;为子弟者仰承于父兄,而不望父兄惟己之听,则处事之际必相和协,无乖争之患。”^[14](卷上)教育是一种个体化的实践活动,因为任何一种教育活动都必须通过受教育者自身而发生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教育活动都需要自我教育这个环节才能完成,都应根据受教育者本身的特点实施教育。

4.运用循序渐进的教育方法 循序渐进是指根据子女不同时期发展特点进行教育。同我国重视早期教育的优良传统相一致,我国在很早就发现儿童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发展特点,并根据这些发展特点实施不同的教育。如早在西周时期,周代贵族家庭就有一套按儿童年龄安排教育的程序,《礼记·内则》对这一程序作了介绍:“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记。”宋代司马光根据《礼记·内则》的记载,还制定了幼儿教育的十年教学安排:如一至三岁学习数与方名,研练书法;七岁读《孝经》《论语》;八岁诵《尚书》;九岁诵《春秋》及诸史;十岁就读《诗》《礼》《传》,略通大意,逐步通晓经史之学。《三字经》中教育子女的程序为:“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经既明,方读子,撮其要,记其事”;“经子通,读诸史,考世系,知始终”。正是通过这样由浅入深,由经到子再到史的学习过程,为子女打下良好的学习基础。尽管我国古代在实施循序渐进的教育方法时有过于僵硬的倾向,但总的来说,根据儿童不同发展时期身心发展的情况实施教育,是符合教育规律的。现代心理学已证明,人的思维发展有一定的层次性和阶段性,应依据不同层次和阶段特点实施教育,因而循序渐进的教育方法在我国现代仍有广泛的借鉴价值。

5.注重环境塑造的教育方法 我国古代家庭教育中非常重视环境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的作用,广为流传的孟母三迁的故事就是生动的例证。据司马光《家范》记载,孟子家曾住在靠坟墓附近,孟子常“嬉戏为墓间之事,踊跃筑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之也。’乃去。舍市傍,其嬉戏为炫卖之事。孟母又曰:‘此非所以居之也。’乃徙。舍学宫之傍,其嬉戏乃设俎豆,揖让进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3](卷一)这充分说明孟母重视选择优越的环境教育儿子。

家庭整体环境对子女的成长也非常重要。我国古代家庭教育中非常注重家庭传统、家风的培养,所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就是注重家庭整体环境建设的表现。颜之推就强调:“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墨子悲于染丝,是之谓也。”^[9](《慕贤》第七),司马光在《家范》中提出:“夫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犹生长于齐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犹生长楚,不能不楚言也。”^[3](卷三)我国家庭教育中注重环境塑造的教育方法,在当今仍不失其现实价值。

我国家庭教育优良传统和方法是我国传统教育中最有特色的一部分内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它直接陶冶着我们民族精神,锻造着我们民族性格,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的历史文化渊源和动力源泉,对于我国当前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开展家庭美德教育,具有深远的借鉴意义。

注 释:

① 参见马铺:《中国家族教育史》,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5年 5月第 1版;黄钊:《中国道德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4 月第 1 版;冯瑞龙、詹杭伦:《华夏家训》,天地出版社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参 考 文 献]

- [1] 孟轲.孟子[M].陈戌国整理.长沙:岳麓书社,1991.
- [2] 孔丘.礼记[M].黄侃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57.
- [3] 司马光.家范[Z].王美英整理.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1998.
- [4] 孔丘.孝经[M].黄侃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57.
- [5] 孔丘.论语[M].陈戌国整理.长沙:岳麓书社,1991.
- [6] 范曄.后汉书[M].王先谦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59.
- [7] 姚思廉.梁书[A].徐楚桥.廿五史精选文白对照与导读[C].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
- [8] 毛水清,梁扬.中国传统蒙学大典[Z].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
- [9] 颜之推.颜氏家训[Z].王利器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10] 刘向.列女传[M].张涛整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
- [11] 贾谊.新书[A].百子全书[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 [12] 程颢,程颐.二程遗书[M].王孝鱼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81.
- [13] 张英.聪训斋语[M].刘洪权整理.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1998.
- [14] 袁采.袁氏世范[M].黄正雨整理.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 叶娟丽)

Family Education in Ancient China Fine Traditions and Methods

—— Based on the Studies of Documents on Family Education

SHE Shuang-hao

(Wuhan University Law School,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SHE Shuang-hao (1964–),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Wuhan University Law School, majoring in moral education.

Abstract There exists unique contents and methods in ancient Chinese family education, which are characteristically “various in kinds”, “systematic in theory”,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nd “rich in documents”. Fine traditions include “identification of home and nation”, “priority given to morality education”, “humanity goes first”, “significance of learning”, and “start education early”. Typical methods include “being king and strict at the same time”, “practicing what one preaches”, “aptitude-oriented teaching”, “advance gradually in due order” and “attaching significance to the environment”. The above traditions and methods are of far-reaching referential significance for family education in the modern time, an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spiritu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family education; fine tradition; method